

公共卫生风险的本质规定、生成根源与治理路径

高峰 于洁

摘要：公共卫生风险作为社会问题已被高度重视。防范化解公共卫生风险的基本前提，是科学把握其本质规定、生成根源和治理路径。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提供了透视公共卫生风险本质和防范化解公共卫生风险的总体性理路。从这一理论视角看，公共卫生风险作为现代社会风险本质上是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伴生物，有其生成的复杂社会根源。新时代防范化解公共卫生风险，应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公共卫生风险创造条件；有效发挥科技对消解公共卫生风险的关键支撑作用；完善防范化解公共卫生风险的制度体系；强化风险分担意识，构建个人与社会在公共卫生风险防控中的协同关系；积极汲取公共卫生风险防控的历史经验；加强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防范化解公共卫生风险共同体。

关键词：公共卫生风险；本质规定；生成根源；治理路径；马克思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R197.1；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23）02-0108-08

不同学科对公共卫生风险问题的研究有不同视角，例如生理学、病毒学等侧重于探讨公共卫生风险在生理、病理层面的机理，临床医学力求通过救治病人来遏制和消除疫情侵害生命健康的风险，社会学等则力求揭示公共卫生风险生成、传播和防范化解的社会机制。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立足唯物史观，从总体上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发展逻辑和动力机制，基于生产方式及相应的社会结构体系的矛盾运动阐明了解决现代性矛盾的基本路径，这对我们认识和把握公共卫生观念风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前提和思维框架。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出发有助于我们把握公共卫生风险的本质，又能找到防范化解公共卫生风险难题的根本出路。

一、公共卫生风险的本质规定

从一般意义上说，公共卫生风险作为社会风险的一种特殊类型和具体形态，是指由公共卫生事件所引发的整个社会生活的一种不确定状态，这种不确定性在一定条件和程度下会造成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巨大损害^[1]。概而言之，公共卫生风险是可能发生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随之引发的严重消极社会影响。这个意义上的公共卫生风险至少包括两类：一是由病原体或疾病引发，扩散和危害公共健康和生命安全，并可能继续对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健康运行构成威胁；二是由于人的某种社会活动对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具有危害性，由此生成严重公共卫生事件并可能持续发酵。本质而言，

公共卫生风险不是只存在于公共卫生领域中的局部性风险，而是既存在于公共卫生领域又广泛渗透和作用于社会生活的社会风险。深刻认识其本质属性，是积极应对公共卫生风险挑战的必要条件。

（一）危害性。从既有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及其后果看，公共卫生风险对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构成直接性重大威胁。公共卫生事件突发后，携带病原体的人或物通过一系列活动形成一对多或者多对多的传导路径，弥漫到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和活动空间中。如果潜在和生成的公共卫生风险不能被及时防控化解，必然会导致疾病大范围扩散，广泛波及并损害公众的生命健康。

2002年至2003年期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的大流行是21世纪人类面对的首次新发疾病威胁。SARS作为一种无病媒、人际传播的呼吸系统疾病，感染无症状的潜伏期超过一周，能够通过国际旅行和国际贸易中的载体传播到世界各地。由于在认识和医疗手段等各方面不可避免存在局限性，SARS病毒使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众多人口受到感染，剥夺了许多人的生命。2019年底暴发至今仍未完全褪去的新冠疫情，肆虐于全球，夺走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上述情况表明，公共卫生问题蕴含巨大风险，如不能有效控制，会对公众的生命健康产生严重危害。虽然人类努力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应对能力，但自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公共卫生事件及其风险对人类的侵害不仅并未降低和减小，反而具有波及面广和影响更深重等新特点。

（二）系统性。在公共卫生问题产生时，所蕴含的公共卫生风险至少存在于两个层面：其一就人的个体而言，某种病毒侵入人的身体，不仅会产生相应病症，而且可能全面侵害人的生理机能，损害人身体的整体健康甚至危害到生命安全；其二就社会结构体系而言，人是社会结构体系和社会活动系统的主体，公众的生命健康普遍受到危害，正常的社会活动受到影响，并产生各种恐慌心理，必然对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巨大冲击。以新冠疫情为例，因疫情冲击世界各国经济普遍受到冲击，产生各种社会问题，甚至波及和危害政治秩序。在信息时代和经济全球化时代，交往的共时性和普遍化使社会结构体系各领域、各层

次间联系更加紧密，联动性更强，不仅是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都难以仅凭自身能力抵抗公共卫生风险的挑战，这客观上要求必须构建相应的卫生健康共同体。

（三）公共性。共同体由个体构成，但又具有超越于个体性的共同性或整体性。这种属性是群体内部个体间通过交往和相互作用生成的，它源于个体又超越于个体并作用于个体。正因为人们因各种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通过各种生产和生活方式进行交往，因此一旦在个体身上产生问题，就不可避免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联结而程度不同地作用于其他人，影响到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整体状况。

具体到公共卫生领域，个体性的疾病并不构成公共卫生问题，一旦疫情具有极大的传染性并难以及时被阻滞和控制时，越来越多的人将面临被感染的危险，公共卫生问题及其公共卫生风险就随之产生，公共性特点集中显现。人类对于新病原体和相应疾病的了解和应对方式在开始时不可能非常充分，如防控举措不科学并存在滞后性，由个体传播到群体、由特定区域延伸到更大空间的风险就会不断增加，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的交往方式和社会条件一定意义上更是助长了风险的传播，往往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系统性影响，产生叠加效应。需要注意的是，公共卫生问题及其风险可能波及全社会的各个阶层，甚至是世界每一个角落，公众都可能成为风险的承受者和受害人，但风险的社会传播机制和分担机制却使不同的社会主体经受不同的风险，先后不同，强度不同，后果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公共性呈现为内含差别性和不平等的公共性。例如底层劳动者和贫穷国家经受更多更大风险的威胁，这显示出诸多社会根源特别是现代社会医疗卫生条件特别是相应政策、国家对公共卫生问题干预方式、社会保障体制机制等制度性因素对公共卫生风险的不同影响，也显示出探求公共卫生风险的社会根源和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公共卫生风险处置机制的重要意义。

（四）时代性。虽然任何时代的公共卫生问题都伴随相应风险，但现代公共卫生问题引发的公共卫生风险显现出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鲜明特点。前现代社会的公共卫生问题多与战争动乱、

不良习俗、饥荒等因素相关,且多暴发于特定区域,其公共卫生风险具有局部性的特点,往往不具有社会整体性效应,更谈不上全球性效应。在现代社会,生产条件、交通工具、社会体制、交往方式等为公共卫生问题的扩散创造了条件,甚至易于突破民族、区域、国家的界限,在世界范围内暴发,使公共卫生问题易于发展成为危害全球公众生命健康和阻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风险问题。

事实上,除了上述四种突出的本质属性之外,公共卫生风险还显现出其他性质特点如非常规性,突发性,复杂性等。显然,从比较的视角看,公共卫生风险既有与其他类型或其他领域的社会风险共同的本质内容——例如不确定性——也有诸多个性化的属性。究其根源,是因为公共卫生风险的焦点在于与人的生命健康直接相关的公共卫生领域,却又渗透于社会生活各领域,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反应,产生一系列消极社会后果,因而兼有社会风险的一般属性和自身的特殊属性。

二、公共卫生风险生成的社会根源

生理学、病毒学和临床医学等为探求公共卫生风险生成的根源提供了自然科学的视角和相应知识基础,但它们主要以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关注病原体 and 疾病的本质规律。但作为社会问题,还需要从哲学社会科学视角追问公共卫生风险产生的社会机理和治理路径。

(一) 马克思现代性理论提供了透视公共卫生风险社会根源的整体性视角。本文在参考其他理论的基础上,主要从马克思现代性的视域下透视公共卫生风险问题。只有将公共卫生风险放在现代社会的整体性分析框架中,才可能真正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其实践基础、社会属性和生成规律;而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具有特殊理论属性,能够为公共卫生风险分析提供科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既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即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意义,强调现代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又批判了资本通过生产劳动对现代社会异化关系的建构作用。

“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

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2] 资本具有一种奴役人的力量,这种力量越来越显示出阻碍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消极作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出人的异化和异化的人,造就了建立在在不平等关系和单向度生存基础上的“虚假共同体”,指出未来的理想社会应是建立在“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基础上的“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总体来说,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不是从文化心理出发反思现代社会,而是立足现代生产方式揭示现代社会的系统性变化,从人类社会整体出发剖析了现代社会的矛盾性并揭示了这种矛盾产生的根源。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风险的社会根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

从现代生产方式出发理解公共卫生风险,可以发现现代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性在公共卫生风险问题上同样表现出来。一方面现代人试图通过推动医疗技术进步、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态环境改善等解决问题,力求阻滞风险的生成和传播,维护健康,延长寿命;另一方面对自然的征服又破坏了生态环境,同时换回自然以病原体 and 疫病方式对人类的“报复”。新的生物制品被研发出来,又伴随不同意义上的生物安全风险。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利益矛盾和紧张关系,为风险防控化解设置了有形和无形的障碍。公共卫生风险问题是现代社会内在矛盾性的一种反映。

(二) 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看公共卫生风险生成的社会根源。第一,大工业对于现代公共卫生风险具有两重作用。公共卫生风险在农耕社会和工业社会其性质特点有显著差异。农耕生产方式建立在简单生产工具和畜力基础上,生产规模小,主要以自给自足为生产目的,公共卫生风险的影响范围和社会性后果相对有限。现代生产方式则是一种以建立在机器生产和生产分工日益细密基础上的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它从根本上塑造了公共卫生风险在现代社会的性质和特点。

大工业一方面把公共卫生风险作为伴生物生产出来,另一方面提供了防范化解它的更充分条件。大工业生产把数量众多的生产者组织起来共同劳动,并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变为商品。生产者在追

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突破人与自然的既有接触边界,扩大征服自然的范围。人与沉睡的自然物质的距离在不断拉近,致命病原体或在人对自然日益深入的干预下被唤醒,从自然界传导到人的生活领域。包括生物科技在内的科学技术直接或间接应用于生产过程,在辅助创造生产效益的过程中也不断创造新生物成果,有的对人与环境构成严重危害。当然,大工业不断提供了更加富足的物质产品,为提升防控和消解风险能力提供更充分的条件,但包括公共卫生风险在内的社会风险也如影相随。伴随大工业发展和劳动分工深化,社会的组织化和联动性程度加强,公共卫生风险压力从弱到强、波及面从近到远、危害性由小到大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在一定意义上,现代公共卫生风险正是大工业生产出来的副产品,它附着于大工业生产以及相应的社会活动,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或以“灰犀牛”式或以“黑天鹅”式暴发。在当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越来越深切感受到某种病毒从蝙蝠洞蔓延到大城市的人类身上也许只需要几天时间。如果不能有效控制,风险将波及所有人,酿成更大范围的公共卫生灾难。

第二,资本对利益最大化的追逐促动公共卫生风险渗透到人类生活各领域。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逐为大工业提供了内在动力。资本主义大工业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经济基础,少数人凭借占有生产资料而最大限度地逐利,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孕育了包括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在内的各种危机并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广大生产者在劳动和生活中不得不处于包括公共卫生风险在内的严重风险处境中。历史上的多次流行病状况表明,疾病对不同人的影响有差异,流行病偏爱折磨穷人的身体。

资本的本性是追逐更大的利润或利益,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资本就会置一切风险于不顾。对此,恩格斯指出:“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3]“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是资本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初期不顾一切逐利的典型案例。为在短时间内获得更大利益,通过暴力对农民进行掠夺和驱赶,把大

量人口推向工厂和城市贫民窟,人口的过度膨胀造成工人的生存环境恶化,同时也不断挤压其他生物的生存活动和繁殖空间,人与自然的生态系统平衡不断被打破。

虽然当今社会方方面面已发生巨大变化,但资本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它贯穿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并向社会其他领域渗透,使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在公共卫生风险的生产和分配上也鲜明地体现出来,特别是最先存在于劳动群体的公共卫生风险在资本利益面前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资本逻辑主导下催生公共卫生风险并使之向全社会延伸的可能性始终存在。

第三,交往普遍化使公共卫生风险增大了无限扩散的可能性。伴随生产向大工业转化以及世界市场开拓,资本的触角逐渐渗透到世界每个角落。至少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人类极大地拓展了自身直接生活的物理和社会空间,科学技术和物质基础特别是交通工具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又为人类交往实践提供了更充分和便利的条件。人类的触角越深入,纯粹的自在自然就越缩减,同时自然界又以自己的方式反作用于人类。正如有西方学者所言:“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入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4]在此过程中,原本处于相对孤寂状态的病原体借助人员交往和货物流动在越来越大的时空中扩散,风险也随之扩散。在经济全球化和交往普遍化的背景下,短时间按下暂停键是备选路径,但长时间的封闭却被证明为不可行,这一定意义上又加剧和放大了风险的危害。以疾病产生的风险为例,一方面,当今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病种已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像艾滋病、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SARS病毒以及三年来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都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现代医学既有认知;另一方面,正是建立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的交往普遍化,使疫病及其风险外溢,不仅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对人类既有治理方式构成严重挑战,也对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消极影响。

第四,个人权利至上的价值观瓦解公共卫生风险防范化解的社会基础。公共卫生风险防范化解举措应建立在资源整合以及社会协同合作的基础上,这是由该风险的系统性和公共性等特点所要求的。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文化传统,塑造了个人权利至上的价值观,并贯穿在从个人生活方式、社会意识形态再到社会制度体系各领域。在社会政治制度安排上,所谓“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被明确界限和严格区分,私人财产、个人自由等神圣不可侵犯,政府只能以守夜人身份或作为“必要的恶”而存在,公共权力非必要不得干预私人领域,这自然使公共权力在防范化解公共卫生风险时难以有效地发挥整合社会力量和集聚资源的作用,社会力量内部由于个体之间权利的冲突导致本应相互协调以共同应对风险的能力和效果减弱。

综上,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出发,可以透视出现代公共卫生风险发生的社会机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虽在一定意义上聚焦于资本主义批判,却蕴含对现代社会结构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认识,因而我们既可以以此透视和批判资本逻辑及其社会后果,也可从中抽取出透视现代社会问题发生机理的思维框架。就公共卫生风险问题而言,我们既需要依托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对照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疫情处理和防范化解相应风险上的各种差异,批判西方资本主义之不足,也需要依此思维方式理解现代公共卫生风险的发生机理,找寻防范化解公共卫生风险的有效路径。

三、防范化解公共卫生风险的实践智慧

公共卫生风险作为重大社会问题,虽然其焦点集中在公共卫生健康领域,实际上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因此,处理公共卫生风险问题,既要有针对公共卫生健康领域的直接性举措,又要在根本和宏观层面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措施。

(一)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公共卫生风险创造条件。如前所述,现代公共卫生风险本质上是建立在大工业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生产方式的副产品,是人在谋求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难以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的关系的问题表现,这一问题的焦点在人

的卫生健康领域,但其产生根源和最终影响都在于社会生活整体领域,这客观上要求一方面要发挥现代生产方式在提升防范化解公共卫生风险能力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从根本上消解公共卫生风险滋生的土壤创造条件。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5],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作为价值目标和本质要求。实践表明,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符合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又符合中国具体国情;既符合世界现代化道路的一般原则,汲取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的长处,又能避免以往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偏颇和缺陷。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首先要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等。在新时代,我们在推动事业发展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与安全,注重处理好社会各阶层关系,特别是整体上消除绝对贫困,同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从而使社会整体发展的协调度不断增强,风险治理能力不断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国是一个有着十四亿多人口的大国,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风险,始终是我们须臾不可放松的大事。”^[6]在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面前,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尊重科学,根据疫情变化规律及时调整应对疫情的政策策略,使疫情带来的风险得到最大限度的抑制与化解。

(二)有效发挥科技对消解公共卫生风险的关键支撑作用。公共卫生风险的消极意义决定了与公共卫生领域有直接关联的临床医学、生物医药等科技领域需要适当超前发展,其投入应得到保障,这既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也是更大力度上保障民生的需要。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能够在病毒溯源、疫情监测、防病救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有助于构建高效的风险预警预测和应急体系,因此应加强信息赋能,大力提升公共卫生领域的信息化水平。由于公共卫生风险是具有复杂性的社会问题,涉及领域众

多,因而加强在解决公共卫生风险问题上的跨学科、跨领域研究显得尤为需要。风险的性质特点对相关科技的创新性不断提出新的要求,特别应加强原始创新,以尽可能使风险代价降至最低。当然,既要鼓励科学技术在公共卫生风险防治方面的创新作用,同时也必须加强规范管理,防止生物科技等领域研究自身成为引发公共卫生风险的源头。

新冠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加快推进人口健康、生物安全等领域科研力量布局,整合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医药卫生、医疗设备等领域的国家重点科研体系,布局一批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加大卫生健康领域科技投入,加强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医疗健康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加快提高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储备能力。”^[7]这从国家层面加快提升防范化解公共卫生风险的科技支撑能力指明了方向,包括疫苗研发等科技工作已在防止疫情风险进一步加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显然需要更加注重提升公共卫生领域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突破诸多“卡脖子”技术。同时,由于全国各地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以及一些偏远城市公共卫生条件薄弱,各方面投入不足,易成为公共卫生风险治理短板,因此在增加投入的同时,应注重运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和完善与发达地区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对口支援机制,以科技手段助力提升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我国抵抗公共卫生风险的整体能力。

(三)完善防范化解公共卫生风险的制度体系。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有针对性地加强制度建设,以制度的确定性和系统性消解风险的不确定性和突发性。体制和机制作为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性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实现基础性制度的功能。解决公共卫生风险问题首先聚焦于维护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这个领域,例如制定和完善医保、医疗卫生服务、基本药物制度等,但也不能只是局限于医疗卫生这个专门领域,而必须延伸到社会结构体系的各领域和各方面。只有构建起涵盖防控和医治这两方面的制度体系,才能把公共卫生风险

控制在最小程度。

按照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制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并非任由社会主体主观意志随意决定,而是从根本上取决于生产方式的性质,生产方式为形成相应的社会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确立起相应的社会制度体系和社会运行方式提供了根本前提和基础。事实表明,我国当下的社会制度体系,特别是国家的根本性和基础性制度,符合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生产力发展要求,适应人民群众追求健康与安全的向往,因而从根本上和总体上为防范化解公共卫生风险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前提。新冠疫情暴发后,我们党为以最小的代价减少疫情外溢和蔓延风险,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立足全国“一盘棋”的战略定位,调动防控和医治各类资源,群防群控,不断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特别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功能。

当然,在现代社会,由于阶层、利益、观念等分化严重,运用统一的风险防控措施越来越难以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加之对疫情风险的认知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在某一特定的阶段对风险变动规律的把握有限,因而难免出现各种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科技手段加强对疫情及其风险的及时跟踪与应对外,必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观,不断完善制度体系,特别是激励、引导、整合、协调、控制、合作等具体的体制机制,在风险防控中动态实现“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和社会组织利益间的协调与互动”^[8]。总体看来,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我们的治理方式和制度体系取得的成效明显,特别是在疫情风险防范化解的全过程,都坚持法治原则,并根据疫情风险的实际变化,及时修改完善相关法律,这在高度紧张的风险防控状态,有效提升了社会治理和风险防范的规范化水平。

(四)强化风险分担意识,构建个人与社会在公共卫生风险防控中的协同关系。不同利益需求和不同权利诉求需要面对共同的风险防控压力,必然要求强化各社会主体的风险意识,厘清个体、群体与政府的权力、权利和责任,建构不同社会主体协同应对风险的良性循环关系,最大限度地

规避、防控和消解风险。

对个体而言,面对公共卫生风险压力,需要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方式认识风险,正确理解和把握个人自由,处理好个人权利与他人权利、个人自由与公共责任的关系。如果执着于个人权利至上或特权优先,不仅导致公共卫生风险继续扩大和蔓延,最终也会伤害到自身。在新冠疫情发生后,全国人民发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首先集中力量支援武汉的疫情防控并取得巨大阶段性成果。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护工作者作为“白衣天使”在医治环节发挥了关键作用,而武汉人民以自己的坚守和牺牲在防控环节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对于阻滞风险外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后面的疫情防控中,在强化网格化治理的同时,各地方、各领域、各单位等内部之间和内外之间协同合作,人们守望相助,将风险代价降低到最低。

公共卫生风险的公共性等特性决定了对其防控化解必须有公共权力及时有力介入,但这必然涉及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等复杂关系。在新冠疫情风险防控中,“我们一开始就鲜明提出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9],统筹兼顾,协调各方,确定风险防控战略,集聚资源,根据疫情发展动员社会力量同心抗疫,充分发挥我们党集中统一领导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同时,“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体系等方面存在的一些短板”^[10],我们必须坚持法治原则,“健康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公共卫生法律法规体系,健全权责明确、程序规范、执行有力的疫情防控执法机制。要普及公共卫生安全和疫情防控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全民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用法意识和公共卫生风险防控意识”^[11]。这既是我们三年来防控化解公共卫生风险的经验总结,又是我们继续努力的方向。

(五) 汲取公共卫生风险防控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伟大斗争历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奋斗史,也是在不断发展公共卫生事业中提升公共卫生风险防控能力的历史,其中积累了丰厚的历史经验,蕴含公共卫生风险治理的规律性认识,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党的几

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毛泽东同志在1951年9月为中央起草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12],他还强调要把卫生防疫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地区。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整体方向和政策方针,高度重视环境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江泽民同志强调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胡锦涛同志强调公共卫生事业要突出公益性质,大力发展基层卫生事业,增强医院的公共服务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卫生健康方针,把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作为基本职责,成功防范和应对了甲型H1N1流感、H7N9、埃博拉出血热等突出疫情,主要传染病发病率显著下降”^[13]。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与安全,包括公共卫生事业在内的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了新的伟大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14],并从历史和现实的宏阔视野,总结了疫情发生以来积累的抗疫斗争经验和深刻启示,显然,这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得出的抗疫经验和启示,也是从防范化解公共卫生风险的根本之道。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了疫情防控及其风险化解的具体路径,建设平战结合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和科技支撑,提升应急物资储备和保障能力,夯实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基层基础;树立全周期的城市健康管理理念,增强社会治理总体效能;重视生物安全风险,提升国家生物安全防御能力;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有效防范和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等^[15]。上述原则和具体经验举措,例如: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结合,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着力提高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构筑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完善疾病预

防控制体系,集中体现了新时代防范化解公共卫生风险的中国智慧。

(六)加强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防范化解公共卫生风险共同体。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从人与社会发展的整体视角看待和解决社会问题,对构建人类防范化解公共卫生风险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事实表明,伴随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进程,公共卫生风险作为重大社会问题其影响广度已远远超过一国范围。病毒和疫情以及各种生态灾难,不分种族、不分国界,会渗透到全球每个角落,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危害。无论是从风险传播还是防控举措看,人类如果不能形成防范化解公共卫生风险共同体,就可能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事实上,面对公共卫生风险的冲击,人类早已在不同程度上共同应对,只是在合作性质上有些是主动,有些是被动;在合作主体上,有些是出于自觉,有些仅是自发;在合作成效上,朝着理想的状态努力。究其根源,除了认知和物质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外,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是影响构建公共卫生风险共同体的最大障碍。当今世界已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公共卫生风险挑战愈加严峻,如果人类不能自觉构筑坚实的应对风险共同体,所付出的代价将愈加严重,甚至威胁人类整体的生存。

我们党和国家向来坚持合作共赢原则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日益得到世界各国认同。“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密切同世界卫生组织和相关国家的友好合作,主动同国际社会分享疫情和病毒信息、抗疫经验做法,向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和技术援助,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16]虽然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抵御公共卫生风险,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但实现这一理想目标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全面深入参与全球公共卫生风险治理,“分享中国方案、中国经验,提升我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17]。

参考文献:

- [1] 高峰. 社会秩序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视域下的秩序问题探讨[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48-51.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276.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000.
- [4] [美]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 耿建新, 宋兴无,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2-3.
- [5]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2.
- [6] 协同推进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科技支撑[N]. 人民日报, 2020-03-03(001).
- [7][9][10][11][12][16][1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C].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9): 109-110, 165-166, 165, 168, 168, 175, 175-176.
- [8] 高峰. 从体制机制创新看当代中国对社会治理秩序的不懈追求[J]. 特区实践与理论, 2020, (1): 29-35.
- [12]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176.
- [14] 习近平.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0-09-09(2).
- [1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17-18.

作者: 高峰, 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究中心(北京工业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教授、博士
于洁, 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钟晓媚